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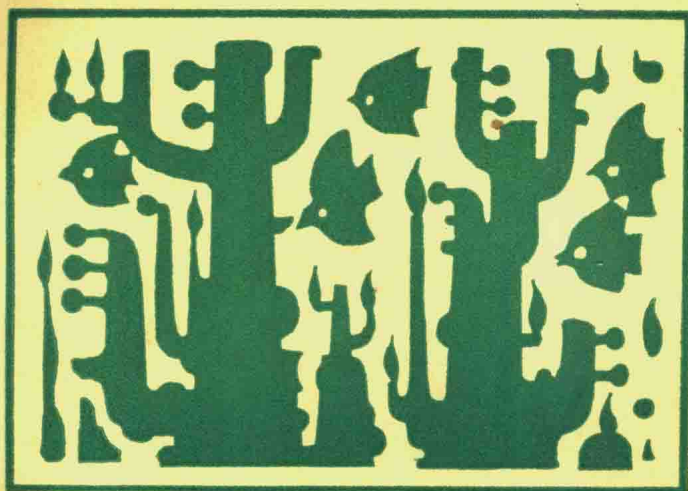
38.241

丁丁

天中教育出版

● LUNSHIWEISHIZUNSHI

● 教育研究丛书



《教育研究》编辑部编

论师·为师·尊师

——给中小学教师

论师·为师·尊师

——给中小学教师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论师·为师·尊师

《教育研究》编辑部编

*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湖北路27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 7.5印张 188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

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400

书号：7348·122 定价：1.45元

序 言

周谷城

《论师·为师·尊师》一书所收论文，无一不是帮助教师做好教学工作的。任取一篇读之，都可得益。我根据这些论文的精神，也向教师们提几点参考意见。（1）莫轻视自己的地位。教师的地位是很重要的，这一点今天更清楚了。我们如果不加思索，仍以为可以弃教职，而另找所谓更好的工作，那是要担风险的。另找工作，并不容易；即使偶尔找到，也未必一定是理想的。于是郁郁不乐，觉得丢掉了光荣而日益重要的教职为可惜。

（2）要重视自己的功绩。教师的功绩，不比其它方面的显而易见，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功绩，也有时不具信心。记得1924——1927年大革命时期，我在长沙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，参加革命。我写了一篇宣言，过多地否定了教师的功绩。徐老（徐特立前辈）看到了，对我说：“谷城，宣言对教师否定太多了。今天的青少年略略知书识字，还要靠他们嘛。”我恍然大悟，立即改了，深知教师的功绩，即自己有时也不具信心。从今天以后，我们应从大处远处着眼，看出自己的功绩而珍惜之。（3）要凭已有的地位和功绩，作出更大的新成就。今天领导英明，看出了教师地位之重要，也看出了教师的功绩之不可磨灭。教师自己如果为旧眼光所限，或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到，甚至思想赶不上形势，不相信自己能做出更大的新成就，那于国家，于人民，于自己都是大不利的。要防止这种大不利，只有高瞻远瞩，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，

放眼世界，放眼未来，不断学习形势，学习理论，学习业务；不断改进教学工作，帮助青少年们很快成长为好公民，好人材。能够这样，教师的快乐，当是无穷的！余不多谈，即以此为序。

1986年3月2日于北京



目 录

序言	周谷城
如果我当教师	叶圣陶 (1)
教师, 塑造新一代人的工程师和艺术家	苏灵扬 (12)
从教六十年答客问	王企贤 (23)
鲁迅论师和为师	陈根生 (45)
谈师德	宋公然 盖绍普 (59)
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	师 心 (67)
教师道德的作用	严缘华 (75)
师爱的作用与意义	胡筠若 (83)
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	璩 平 (95)
中学生喜欢怎样的教师 (调查报告)	谢千秋 (104)
教师工作中的侵权问题	张天麟 (113)
教师劳动与教师劳动力的再生产	程喜田 (124)
教师的劳动和劳动报酬	牛德林 罗 南 (134)
教师劳动的特点	李 旷 潘源琛 (145)

如果我当教师*

叶圣陶

我现在不当教师。如果我当教师的话，我想把以下的话策励自己。这无非“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的意思。“以前种种”是过去了，追不回来的了；惭愧是徒然，悔恨也无补于事，让它过去吧，象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。

我如果是当小学教师，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，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；无论聪明的，愚蠢的，干净的，肮脏的，我都要称他为“小朋友”。那不是假意殷勤，仅仅浮在嘴唇边，油腔滑调地喊一声；而是出于忠诚，真心认他们作朋友，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。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，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。有了欢快，我将永远保持它，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。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；不然，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，我只好辞职。

我将特别注意让小朋友养成好习惯。我想“教育”这个词儿，往精深的方面说，一此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；可是就粗浅的方面说，“养成好习惯”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无论怎样好的行为，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，而不能终身以之，那是扮戏；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，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，而不能彻底消化，举一反三，那是语言的游戏；都必须化为习惯，才可以一辈子受用。让小朋友养成好习惯，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，硬是要养成，决不马虎了事。譬如开关门窗，我要教他们轻轻的，“砰”的一声固然要不得，足以搅动人家的心思的“咿呀”声也不宜发出；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，才认为

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如果种植菜蔬，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，根入土要多少深，两棵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，灌溉该怎样调节，害虫该怎样防御，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；直到他们不论何时何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，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坏习惯，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。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，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，还肯作奸犯科，干那种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？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，都能为收到成效而切实下工夫，对于自然原理的认识，社会现象的剖析，还肯节省工夫，贪图省事，让它马虎过去吗？

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，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作为终极的目的。我要从这方面使小朋友养成语言的好习惯。一个词儿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，怎么写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，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。一句句子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，怎么讲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，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。一篇故事，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。一首诗歌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。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，使他们养成语言的好习惯，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，才是终极的目的。

我决不教小朋友象和尚念经一样，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。这样唱的时候，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，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，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。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，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，又有什么意思？

现当抗战时期，书本的供给很成问题，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书，可是我决不说“没有书本，怎么能开学呢！”我相信书本是一种工具，或者说是一种凭藉，却不是唯一的工具，唯一的凭藉。许多功课都不一定要利用书本，也可以说，文字的书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书本。非文字的书本罗列在我们周围，随时可以取来利用，利用得适当，比利用文学的书本更为有效，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条文字的桥梁。公民，社会，自然，劳作，关于这些课

程的非文字的书本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书铺子里没有书卖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只有国语是非有书不可的；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，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，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

小朋友顽皮的时候，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，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上打一下。打了一下，那痛的感觉几分钟就消失了；就是打重了，打得他们身上发红了，发肿了，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；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。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，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；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，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，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我有什么权力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？并且，当我打他们的时候，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，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，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，也许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可厌。我是一个好好的人，怎么能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？我既要作他们的忠诚的朋友，要让他们养成好习惯，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？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，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费了吗？以后的努力不是将会不生效果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。他们顽皮和愚笨，总有一个或多个原由；我必须根据我的经验，通过观察和剖析找出原由，再根据原理给以对症的治疗。只要切切实实这样做了，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的周围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，也就立刻转为心平气和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。

我还要做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，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，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。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，我要使他们养成好习惯，必须与他们的家庭取得一致才行。我要他们往东，家属却要他们往西，我教他们这样，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，他们便将徘徊歧途，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了。作学生家属的亲切忠诚的朋友，我想并不难，拿出真心来，从行为上、语言上、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，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；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，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？

我如果当中学教师，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，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“读书”一样。书中积蓄着的古人和今人的经验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；但是就学生方面说，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，尤其重要在能够随时随地就事物物得到新经验——不限于书中的经验，说了“读书”，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，好象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。因此说了“教书”，也就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，好象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：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，能够去应考试，取功名，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；而我呢，却要使学生能做人，能做事，成为健全的公民。在这里我不敢用一个“教”字。因为用了“教”字，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本领，可以把这套本领双手授予学生。难道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？难道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——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？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罢了。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，经验多一点，给他们指点一些方法，提供一些实例，免得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，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——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“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”；我决不说“教书”。

我不想把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等抽象的德目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。我认为这种办法毫无用处，与教授“蛋白质”、“脂肪质”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。忠于国，忠于家，忠于朋友，忠于自己的人，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，存于内心，发于外面，无不恰如分寸；他决不会因为想到德目中有个“忠”字，为了要实做那个“忠”字，才这样存心，这样表现。关于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爱”，也是如此。进一步说，想到了“忠”字而行“忠”，那不一定是“至忠”；想到了“孝”字而行“孝”，那不一定是“纯孝”；因为那是“有所为”，并不是听从良心的

第一个命令。为要使学生存心和表现切合某种德目，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，毫不勉强，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，使学生养成好习惯。譬如，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，如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，我自己奋力参加，同时使学生也奋力参加；当社会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，竭知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；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，养成学生的好习惯，综合起来，他们便实做了“忠”字。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？第一，我是一个公民，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，本应当“忠”；第二，这样才算是指点方法，提供实例，对于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。

我认为自己与学生是同样的人，我过的是学生同样的生活：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，我自己一定实践；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，我自己一定不做。譬如，我希望学生整洁，勤快，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、服装、办事室、寝室弄得十分整洁，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十分勤快；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，待人以诚，我每说一句话，一定算一句话，我对学生和同事，一定掏诚相示，毫不掩饰；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，我一定不抽烟卷，决不说“你们抽不得，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”的话；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，我一定不破坏秩序，决不做那种树党分派，磨擦倾轧的勾当。为什么要如此？无非实做两句老话，叫做“有诸已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已而后非诸人。”必须“有诸已”“无诸已”，表示出愿望来才有诚意，吐露出话语来才有力量，也易于使人受感动。如果不能“有诸已”“无诸已”，哪里还有诚意？表示和吐露的时候，自己先赧然了，哪里还有力量？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，无论我当不当导师，我都准备如此，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。凡负教师的名义的人，谁都有帮助学生责任。

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情。设立学生自治会了，组织学艺研究社了，通过了章程，推举了职员，以后就别无下文，与那些没有会社的时候一样，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创办图书馆了，经

营校园了，一阵高兴之后，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，一天没有一两个读者，校园里蔓草丛生，蛛网处处，找不到一棵象样的蔬菜，看不见一朵有生意的花朵：这便是有名无实。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情比不做还要糟糕；如果学生习惯了，终其一生，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这样有名无实，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？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，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，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，不要有图书馆、校园之类的设备。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，必须名副其实。自治会硬是要“自治”，研究社硬是要“研究”，项目不妨简单，作业不妨浅易，但是只要提了出来，必须样样实做，一毫也不放松。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，有了校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，规模不妨小，门类不妨少，既然有了这种设备，必须切实利用，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。而且干那些事决不是一时乘兴，既然干了起来就要一直干下去，与学校同其寿命。如果这学期干得很起劲，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，今年名副其实，明年却徒有其名了，从整个过程说起来，还是个有名无实，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。

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都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，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，养成使用语言文字的好习惯，理化科在懂得自然，进而操纵自然之类；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，那就是“教育”——造成健全的公民。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“辐”，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“教育”的“轴”上，才成为推进国家民族的整个轮子。这个观念虽近抽象，可是很重要。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；有了这个观念，我才不会贪图省事，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，或者过分要好，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。至于做人做事，原是分不来科目的；譬如，一个学生是世代种庄稼的，他帮同父兄做庄稼，你说该属于公民科，生物科，还是数学科？又如，一个学生出去旅行，他接触了许多人，访问了许多古迹，游历了许多山

川城镇，你说这该属于史地科，体育科，还是艺术科？学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；要会开方小数，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；知道了唐朝，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是什么朝代；由于这种不得已，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。可是，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，还是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去旅行一样，是综合而不可分的：那么，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，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的公民那个总目标吗？

我无论担任那一门功课，决不专作讲解的工作，从跑进教室开始，直到下课铃响，只是念一句讲一句。我想，就是国文课，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，探求文章的意义，揣摩文章的法则；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，必须单枪匹马，无所依傍才行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，给他们讲解书报。国文教师的工作只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，领导他们共同讨论：他们如有错误，给他们纠正；他们如有遗漏，给他们补充；他们不能分析或综合，指点他们分析或综合。这样，他们才象学步的幼孩一样，渐渐的能够自己走路，不需要人搀扶。国文课尚且如此，其他功课可想而知。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，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，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；这种情景，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，多么滑稽又多么残酷啊！为什么说滑稽？因为这样之后，任何功课都变为国文课了，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。为什么说残酷？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别的工作，这样听讲要连续四五个钟头，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。我说刑罚，决不是夸张；试想我们在会场中听人演讲，讲演者的话如果无多意义，很少趣味，听了十分二十分钟便感觉厌倦了；即使演讲者的话颇有意义，富于趣味，如果延长到两三个钟头，我们也要移动椅子，拖擦鞋底，作希望离座的表示；因为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东西，被动的东西做得太久了，便不免有受刑罚似的感觉。在听得厌倦了还不得不听的时候，最自然的倾向是外貌在那里听，而心思并不在听；这当儿，也许游心外骛，一心以为有

鸿鹄将至，也许什么都不想，象老僧入了禅定。教学生一味听讲，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者什么都不想，无异于摧残他们心思活动的机能，这岂不残酷？

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；我要教他们试读，试讲，试作探讨，试作实习，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，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。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，我不滔滔汨汨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。他们尝试过了，我才讲，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，我只是给他们纠正，给他们补充，指点他们分析或综合。

我如果当大学教师，还是将我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。依理说，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；我或者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，或者用商务印书馆的《大学丛书》和别的书给他们作课本，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看下去，用不着我教。如果我跑进教室去，按照讲义上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，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，在我是徒费口舌，在他们是徒费时间。那太无聊了，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。我开一门课程，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，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“心得”，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，向学生口讲手画。我不但把我的一点给与他们，还要诱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。唯有如此，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，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，明日超过今日。这就不是“教书”了。若有人问这叫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：“帮助学生为学。”

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授徒弟，往往藏过一手，不肯尽其所有地拿出来；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，徒弟无论如何高明，总之比我还少一手。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，决不藏过我的一手。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，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，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尽量公开在学生面前。那途径即使是我自己开辟的，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见的，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见，也由于种种的“势”，因缘凑合，刚刚给我把捉住了；我有什么可以矜夸的？怎么能把

这些当作独得之秘？我如果看见了冷僻的书或者收集了难得的材料，我决不讳莫如深，只是偷偷地写我的学术论文。别的人，包括学生在内，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，写出学术论文来不将和我的一样好，或许比我的更好吗？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，侥幸于自己的“有”，欣幸于别人的“没有”，这实在是一种卑劣的心理，我的心理自问还不至于这么卑劣。

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，扳起脸来对学生说，什么思想不许接触，什么书籍不许阅读。不许接触，偏要接触，不许阅读，偏要阅读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尤其在青年。禁遏终于不能禁遏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并且，大学里的工夫既是“为学”，既是“研究”，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该是越多越好；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，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？在化学实验室里，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元素，明知它含有毒性，一样的要教学生加以分析，得到真切的认识。什么思想什么书籍，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，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元素一样看待，还是要加以研究？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，从而得出结论，凡真是要不得的，他们必将会直指为要不得。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，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。

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。凡是我班上的学生，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，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。这与我的课程，或是宋词研究，或是工程设计，似乎没有关系，可是谁能断言确实没有关系？我不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，当休息的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，倾心而谈，绝无矜饰，象会见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样。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，我决不冷然地问：“你们来作什么？”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，问得深一点的时候，我决不摇头说：“你们要懂得这个，还早呢！”问得浅一点的时候，我决不带笑说：“这还要问吗？我正要考你们呢！”他们听我问“你们来作什么”，自己想想，说不出来作什么，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，问得浅也不好，不知

道怎样的问才不深不浅，刚刚合适，以后就再也不问了。这样拖人千里的语言态度，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，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？

我还是不忘记“教育”那个总目标；无论我教什么课程，或是宋词研究，或是工程设计，决不说除此以外再没有我的事儿了。一个教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的教师，他们行为如果不正当，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，却是深刻的；深刻程度还不可估计。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，因为敬重不敬重在学生方面，不在我的方面；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，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，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。取得他们的敬重，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，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“教育”的总目标负了责。

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，我要时时记着，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。建国事业有大有小，但是样样都是必需的；在必需这个条件上，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。而要建国成功，必须参加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，真个能够干他的事业。因此，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，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：甲够格吗？乙够格吗？丙够格吗？……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，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；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，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。

我决不“外慕徙业”，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质的环境能使我安于其业。安排这样的环境，虽然不能说我完全无能为力，但大部分属于社会国家方面，因此，我就不说了。

• 叶圣陶先生此篇写于1941年8月23日，发表于当时的四川《教育通讯》4卷32、33期合刊上。收入本书时，我们请叶至善同志对个别词句进行了修改。

叶老真不愧是一位教育家和文学家。这篇文章虽然写于四十五年前，

对我们今天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来说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〔叶老那种热爱教师职业的深厚感情，使我们感动；那种具体生动的剖白析理，使我们折服。

